



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

提供洞察中国历史的新视角

迪特·库恩，德国著名汉学家，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和柏林大学工作与任教，现任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考古学等领域，尤为擅长物质文化史与科技史、宋史研究。库恩通过其“异域之眼”，考察更宏大全球史背景下别样的中国史，给我们提供了洞察中国历史的新视角。潘洪娥

因关注中国古代织机结缘汉学

库恩出生于1946年，在大学期间先学习了商科、纺织企业经营管理学。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领跑世界的，中国人民创造的竹笼机、多锭大纺车等都可代表当时世界纺织生产的最高水平，这也是库恩较早关注中国纺织技术的原因之所在，他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织机的多部论著。1975年库恩在其第一部著作《中国手织机的描述——对19世纪以前中国农业文化中的织布机的研究》中描述到，“古之人曰——夫不耕或受之饥，女不织或受之寒”，描绘了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美丽图景。正是缘于这种感染，库恩开始对中国纺织的必备工具——织机产生兴趣，并在科隆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东亚艺术和汉学，走上汉学尤其是中国史的研究道路。

1977年库恩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聚焦的主题即是世界上关于织机及其结构最早的记载《梓人遗制》。《梓人遗制》是金末元初木工理论家薛景石对其一生木工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的总结，对纺织机具体结构的介绍比同时期及以后的《农书》《农桑辑要》《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书的相关记载都要详尽具体得多。20世纪70年代后期，库恩受邀到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研究所，从事中国纺织技术史的研究工作。1988年，库恩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九册）《纺织技术：纺纱和缫丝》出版，全面介绍了中国纺织品及纺织技术的发展历程，论述了麻纺和缫丝技术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揭示了中国纺织技术创新对世界其他地区和中世纪欧洲纺织品生产的影响。

重视中国古代墓葬文化研究

库恩研究古代中国不是以理论架空历史事实，而是擅长以实物文化证实改变的社会环境，包括丝绸之路留下的文化遗产、古代王朝贵族的墓葬文化等考古发现。库恩认为中国的墓葬文化是杰出的、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而宋朝时期中国的墓葬文化又是继周朝、汉朝、唐朝以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1985年开始从事中国宋朝墓葬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1990年至1993年，库恩参与由德国研究协会资助的辽宋金时期上层墓葬的社会考古学研究项目，完成了两篇学术报告《死后仍与生前一样？——中国古代上层社会的墓穴》《优于文字记载——研究宋朝历史的一个社会考古学方法》。前者旨在证明，“中国的墓穴的建筑方式以及内部、外部的设施”，其发展变化过程的延续性“在世界上是

独一无二的”，后者旨在告诉人们考古学在研究中国断代史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墓葬研究对于阐释中国社会在公元900年到公元1300年期间发展的重要性。

1994年完成、1996年出版的《一个给死者呆的地方——宋朝墓葬考古学的记录》，对“学者、官员的墓穴种类”“家庭式墓地”等进行了具体而准确的研究，给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宋代墓葬考古研究资料。世界著名考古学大师、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张光直教授为此书作序时指出，“迪特·库恩的这部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学术界尤其是为研究宋朝的历史学家提供了全面而翔实的新资料，而这些新资料便是考古研究发掘出的宋朝的墓葬文化。”

重新审视宋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宋史地位

宋史是库恩中国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其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宋代文化史》，被誉为“欧洲第一部系统的宋代断代史著作”，从宋代的社会结构、农业经济、文化生活、技术成果以及丰富的消费品等各个角度详细介绍了宋代，并且试图阐述在宋代产生的新的社会体制与农业文化、城市文化以及物质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专著《宋王朝——从其文化看一个新社会的形成》，研究了宋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试图用实物文化来证实这些改变了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的另一部著作《地位和礼仪——从远古到公元十世纪贵族的中国》，通过“地位和礼仪”这两个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概念，审视宋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反映库恩长期研究中国科技史、艺术史和宋史鲜明烙印的研究成果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四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哈佛中国史》是201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最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与长期以来对宋代历史地位评价较低的研究不同，库恩从全球史的崭新视角，以地理为经，文化为

纬，聚焦于“儒家治国、改革、军事弱势”三个关键词，搭建起高度评价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叙述模式。从军事威力、战略创新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无疑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繁荣程度而言，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库恩认为，儒家治国是宋朝最重要的特点，在宋朝统治的300多年里，儒家意识形态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形成一股强大力量，宋朝士大夫创造的思想范式，以及儒家价值观的复兴和重建，为后世历朝历代的教育、政府制度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建立了基础。这些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文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转型朝代各项改革制度、思想转变的场景。

总的来看，库恩的中国史研究力求寻找中国历史变迁中的社会因素，试图指出和证明，“在所有的文化中，中国文化具有最持久的延续性……中国文化具有某种内在的强力和变迁的能力”。库恩给我们建构了洞察古代中国尤其是宋代历史的异域坐标，其“中国观”为中国本土学者和读者认识中国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据《学习时报》

周有光拜会爱因斯坦



1946年12月，周有光被派到美国工作，好友何廉常来找他谈天说地。有一天，何廉一脸神秘地告诉周有光：爱因斯坦就在他的学校，听说他最近闲得很，特想找人聊天。周有光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爱因斯坦，那可是科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他的相对论颠覆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此刻，周有光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期待与这位科学巨匠面对面交流。

怀揣着紧张与期待，周有光踏上了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的行程。一路上，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爱因斯坦的形象，心中默默想着见面时要说些什么。终于，他站在了爱因斯坦的面前。爱因斯坦亲切的笑容，瞬间驱散了周有光心中的紧张。眼前的这位科学巨匠，衣着朴素随意，与周有光他们的西装革履截然不同。

二人的对话从纽约街头的繁华景象，到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再到美国社会的种种现象……爱因斯坦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对世界独特的洞察，他的见解深入浅出，让周有光深受启发。周有光则讲述自己在银行工作中的见闻与感悟。爱因斯坦的随和与谦逊让周有光倍感亲切，两人如相识已久的老友，畅所欲言，毫无保留地分享着自己的想法。然而，周有光心中也有一丝遗憾：由于两人专业领域不同，一个是研究宇宙奥秘的物理学家，一个是钻研经济规律的银行家，他们的交谈未能深入到学术层面，更多的是轻松愉快地闲聊。

后来，周有光又一次拜访了爱因斯坦。同样的场景、同样轻松愉快地交谈。他的那种突破传统引领时代的思维方式，给周有光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周星 据《人民政协报》

郑洞国亲历的日本投降仪式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军队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记载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

郑洞国在书中回忆，当天，礼堂大厅正中的墙上高高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画像，参加仪式的共有千余人。受降席与投降席均以白绸围绕，整个会场气氛庄严、肃穆。日方代表进场后，观礼席上有些骚动，人们冷眼注视着日方代表，不时低声交谈。日方代表个个面色阴沉、神情沮丧，冈村宁次起立接过降书时显得慌乱，签字的手也微微颤抖。最后，他们是在千余双目光注视下，垂首依次退出会场的。

作为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郑洞国身经百战，先后经历了长城抗战、平汉路北段的涿州、保定战役、徐州会战、昆仑山会战、远征印缅。

出席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不仅是郑洞国军事生涯的历史性时刻，也是他作为一位杰出抗战将领应得的荣誉，他的名字也将与众多抗击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英雄一起，被历史所铭记。

革京艳 据《人民政协报》